

语言: 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附庸

——小说《一九八四》的批评话语分析

长春理工大学 苏 龙 徐朝晖

摘要: 本文以费尔克劳的“三维模型”为理论框架,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从物性、转换、情态和主位结构四个方面对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进而指出,该小说的语言可以反映鲜明的极权主义观和反极权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可知,语言不仅是作家向读者传递信息的渠道,还是反映和重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能够协助当权者行使权力和传递思想。同时,语言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会变成语言使用者言行的桎梏。

关键词: 一九八四; 三维模型; 意识形态; 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23(2019)02-0048-06

一、引言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是一篇政治讽刺寓言,是反极权文学的经典之作。该小说描绘了一个恐怖和令人窒息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极权世界中,人们的语言、行为、思想和意志受到极权统治者的严格操控。本文试以费尔克劳(N. Fairclough)的“三维模型”(Three-Dimensional Model)为理论支撑,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对小说《一九八四》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探究该小说中政治话语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的互动。

二、“三维模型”理论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Fowler et al. 1979)。它旨在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形式特征揭示语言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进而探讨语言背后暗藏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批评话语分析的众多流派中,费尔克劳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影响下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型”。这一理论框架得到了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的推崇与应用。

在 *Language and Power* 一书中, Fairclough (1989: 25) 首次提出了“作为文本、互动和语境的语篇”这一框架。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与演进,他在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一书中修订了先前理论框架中的某些术语,并提出了“三维模型”(Fairclough 1992: 73)。

如图1所示,费尔克劳认为文本是话语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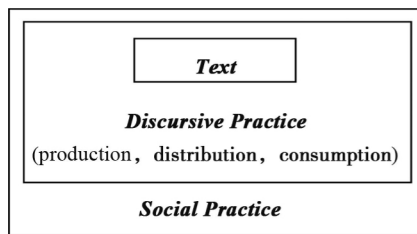


图1 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模型”(Fairclough 1992: 73)

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均受特定社会实践条件的决定。基于此,费尔克劳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步骤:1)对文本的形式结构特征的描写(description);2)对文本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的阐释(interpretation);3)对话语实践过程及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解释(explanation)(Fairclough 1989: 26)。描写层为微观层面,是单纯的文本分析;解释层为宏观层面,是对权力、不平等、偏见等现象的分析,并结合社

会结构来说明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作用的;阐释层介于微观层与宏观层之间,由话语实践将两者联系(辛斌、高小丽 2013: 3)。

“三维模型”分析框架在语言描写层的分析主要借助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从及物性、转换(名词化和被动化)、情态、主位结构等方面对文本进行语言特征描述。韩礼德认为,语言主要有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具有表达人们在客观世界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主要通过及物性系统和语态来实现;人际功能是指语言具有表达讲话者身份、态度、动机、地位及其对事物的推断等功能,主要通过情态和语气来实现(胡壮麟等 1991: 105);语篇功能是指语言具有一种机制可以将任何一段口头或书面的话语组织成连贯的篇章,使一个活的言语信息片段区别于一堆随机排列的句子,主要通过主位结构来实现(胡壮麟 2013: 296)。

三、小说《一九八四》的批评话语分析

小说《一九八四》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描绘了一个假想中发生在未来世界的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压抑而恐怖的社会中,人们的言行与思想意志受到极权主义者的极端控制;第二部分描写主人公温斯顿和裘莉娅的恋情;第三部分描述温斯顿遭到极权统治者的迫害及其被重新洗脑的过程。其中,第一和第三部分的语言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突出反映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本部分将在费尔克劳“三维模型”理论的指导下,先借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从及物性、转换、情态和主位结构四个方面对《一九八四》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文本进行语言特征分析,然后再通过对这些语言特征的阐释和解释来揭露暗含在小说语言中的意识形态,进而探究该小说中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 及物性:极权者的权力滥用

及物性是表现小句的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表明意义的选项,还决定了结构体现的本质,其主要包括六种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胡壮麟 2013: 293)。及物性主要通过参与者(Participant)和过程(Process)两个因素

帮助人们识解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成分(Circumstance)也是一项重要因素。Fairclough (1989: 120)认为,在不同的语法过程和参与者的类型中经常有一个选择,且这种选择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因此,该小说中的及物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通过对小说《一九八四》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文本进行有效的及物性分析,六种及物性过程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一九八四》中及物性过程分布

类别	数量	百分比
物质过程	3488	49.20%
关系过程	1870	26.38%
心理过程	810	11.43%
言语过程	539	7.60%
存在过程	330	4.66%
行为过程	52	0.73%
总数	7089	100%

表1显示,该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共分布着7089个小句,其中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存在过程和行为过程依次出现3488次、1870次、810次、539次、330次和52次,所占比例依次为49.20%、26.38%、11.43%、7.60%、4.66%和0.73%。

物质过程在该小说中出现的频次最高,为3488次,占总数的49.20%,用来阐释极权者迫害民众的残暴行为,进而解释极权者在其统治中的权力主动性。物质过程越多,所描绘对象的动态效果就会越强,相关叙述就会愈加生动逼真。物质过程具有施事者(Actor)和受事者(Goal)两个参与者,突出强调施事者对受事者所施加的行为。小说中物质过程的大量运用将极权者对普通民众所施加的一系列恶行刻画得淋漓尽致,其非人类行为也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

(1) The Party was trying to **kill** the sex instinct, or, if it could not be **killed**, then to **distort** it and **dirty** it.

(Orwell 2016: 58) ①

(2) They **slapped** his face, **wrung** his ears, **pulled** his hair... to **humiliate** him and

① 例句中的斜体、粗体及下画线均为笔者所加。

destroy his power of arguing and reasoning.
(Orwell 2016: 217)

- (3) We convert him , we capture his inner mind , we reshape him , we burn all evil and...before we kill him.
(Orwell 2016: 230)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物质过程均由下画线的动词实现。因下画线的动词为及物动词,所以这些过程都有自己的施事者和受事者。依据相关语境,例子中过程具有相同的施事者——极权者和受事者——被统治者。这些物质过程不但阐述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所施加的暴行和思想控制,还解说了统治者在极权统治中狂妄地行使主动优先权,竭力传播极权思想的趋向。

关系过程频次居第二位,共出现 1870 次,所占比例为 26.38%,主要阐释极权社会压抑而恐怖的状态,进而解释极权统治的高度集权特征。此类过程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分为归属(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类。归属类指某个实体具有的属性或类型,包含载体(Carrier)和属性(Attribute)两个参与者。在 The Ministry of Love was the really frightening one (Orwell 2016: 4) 和 It was terribly dangerous to let your thoughts wander when you...within range of a telescreen(Orwell 2016: 55) 这两个归属类关系过程中,载体分别为 The Ministry of Love 和 to let your thoughts wander when you...within range of a telescreen,属性分别为 the really frightening one 和 terribly dangerous,第一个关系过程说明统治机构——友爱部的可怕性,第二个关系过程表明统治者意识到被统治阶级自由思想的危险性,两者都反映了极权社会的恐怖状态。识别类指由一个实体来确定另一个实体的具体身份,具有被识别者(Identified)和识别者(Identifier)两个参与者。在 Always there were five or six men in black uniforms at him simultaneously , sometimes it was fists , sometimes it was truncheons , sometimes it was steel rods , sometimes it was boots(Orwell 2016: 216) 这一识别类关系过程中,被识别者为 it,具体指极权者迫害普通民众的方式;识别者为 fists、truncheons、steel rods 和 boots 等易造成重伤的器具。此关系过程暗示极权统治的阴森可怕和极权

统治手段的残忍。这些关系过程描绘了大洋国压抑而又令人惊恐的社会环境,意在通过阐明极权社会的恐怖属性来解释极权者血腥的极权统治,并对其进行无情的嘲讽。

心理过程共出现 810 次,所占比例为11.43% 表示感知(Perception)、反应(Reaction)、认知(Cognition)等心理过程,参与者一般有两个——感知者(Sensor)和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胡壮麟等 2017: 73)。小说用心理过程来表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心理动态。See、hear、watch 等大量感官动词均表征感知,处于心理过程的基本层面,体现了统治者低级的心理活动,阐明了极权者在统治过程中单一的监管方式。警告标语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在文中反复出现,尤其能突出极权统治的机械性。与此同时,小说使用了 think、know、believe、dislike、feel、see 等多种表征认知、情感及感觉的动词来刻画被统治者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一般而言,在高度集权的社会中,人们不会有任何个人想法或喜好,然而在该小说中民众却在当权者的极端监控下呈现出多样的心理态势。这种强烈的反差既是对被统治者不满情绪的有力阐释,也是对极权主义残暴无理的有效解说。

言语过程在小说中共出现 539 次,所占比例为 7.60%。它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具有三个参与者——讲话者(Sayer)、受话者(Receiv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胡壮麟等 2017: 79)。言语过程通过讲话主体的讲话方式、语气、措辞等表明其身份、地位、阶级与权力关系。小说中,大部分言语过程的讲话者是极权统治者。此类过程阐述了极权者企图通过话语来操控普通民众的言行与思想这一事实,进一步凸显了极权者在政治生活中占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和绝对的阶级优势这一情形。

- (4) “Up with your hands!” yelled a savage voice.
(Orwell 2016: 20)
- (5) “Stand easy!” barked the instructress , a little more genially. (Orwell 2016: 31)
- (6) “How many fingers , Winston?”
“Four.”
“How many fingers , Winston?”
“Four! Four! What else can I say?”
(Orwell 2016: 225)

上例中 yelled 和 barked 两词突出了统治者狂妄地向民众发号施令的状态,祈使语气传达的讲话内容可以更有效地命令民众按照其意愿行事。最后一组对话中,统治者通过提问和重复的发言方式来操控交谈的具体内容和会话的进展,以此来限制民众的言语自由,禁锢其思想表达。

存在过程共出现 330 次,所占比例为 4.66%,用来表示某物的存在,每个存在过程都有一个存在物(Existent)(胡壮麟等 2017: 80),主要通过 there be 句型来实现。该小说中的存在过程阐释了极权社会中充斥着大量虚假、恐惧、痛苦等负面因素,缺失正常社会中应有的真、善、美这一状态,解释了人们处于悲苦社会境地的原因,也揭示了极权者对人性的鲁莽否认。在 Today there were fear, hatred, and pain, but no dignity of emotion... (Orwell 2016: 27) 和 There was the most terrible oppression, injustice, poverty worse than anything we can imagine (Orwell 2016: 80) 两例中,存在物——fear、hatred、pain、oppression、injustice 及 poverty 等消极成分遍布整个极权政治横行的社会。在 There will be no loyalty, except loyalty towards the Party. There will be no love, except the love of Big Brother...there will be no curiosity, no enjoyment... (Orwell 2016: 241) 中,loyalty、love、curiosity、enjoyment 等都是人类固有的本质,然而在极权主义社会中,为了加强统治,极权者迫使人们放弃这些正常的天性,只允许其保留对党的忠诚和对老大哥的崇拜。在这样没有任何情感自由的社会中,人们过着压抑、痛苦的生活。

行为过程出现的频次最少,共 52 次,所占比例为 0.73%。此类过程在于表现行为者(Behavior)的呼吸、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小说中,shout、breathe、scream、cry 等动词多次被用来描述被统治者的生理活动,阐明了在没有个人自由的极权统治下,人们遭受极权者的折磨与监视,处于像动物一样被驯化的生活状态。人们的 shout、scream、cry 等行为与动物的行为没有太大区别,这不仅是他们对外界痛苦的本能反应,也是他们内心恐惧与压抑的自发性宣泄。这些行为过程生动地解释了在极权者权力滥用的阴影下被压迫者人性的扭曲及其“去人格化”特征。

综上所述,六种及物性过程共同为读者生动

地再现了一幅在极权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当权者对民众进行残暴统治的动态场景,奥威尔借此揭露了极权主义者滥用权力、残暴无理的一面,表达了对极权政治的强烈不满。

(二) 转换: 极权统治的模糊化与合理化

转换是两种不同语法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依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转换通过名词化和被动化两种基本形式来实现概念功能。名词化和被动化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特征,它们的使用受到特定因素的影响,如讲话人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

作为一种语法化或语言形式化现象(Halliday 2000: 352-353),名词化是指“说话人原本可以使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但却选择了名词性成分”(辛斌 2005: 97)。名词化通过掩盖参与者和模糊因果关系达到“非人格化”的语言效果,从而提高意义表达的客观性;通过删除情态成分和模糊时间概念将某种行为或动作变成一种常态或普遍性的事实,从而提高意义表达的合理性。小说中,诸如 alteration、vaporization、destruction、falsification、oppression、elimination、punishment 等名词形式的使用,形成极权政府作为 alter、vaporize、destroy、falsify、oppress、eliminate、punish 等恶劣行为或错误行动的真正施事者缺失的效果,从而模糊了其始作俑者的角色,淡化了极权政府所应承担的罪责及其专断统治的事实。同时,这些名词形式因去除了动词的情态成分和时态,其中蕴含的动作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公认的事实与常态,从而使极权政府的非法行为合理化。此外,小说中 helplessness、uneasiness、astonishment、uselessness 等名词化形式还使被统治者恐惧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变成一种常态。据此可知,该小说中名词化现象通过阐释极权者的非法行为和被统治者扭曲心理的合法化与模糊化状态,解释和讽刺了极权政治的本质和当权者的肆意而为。

被动化是转换的另一种方式,它与名词化有着相似的功能,也可通过隐去动作的施事者来模糊因果关系,进而提升意义表达的客观性、可靠性和权威性。例如,在 the correct documents were stored... where the original copies were destroyed (Orwell 2016: 38)、The past was erased, the

erasure was forgotten , the lie became truth(Orwell 2016: 67) 和 You have been kicked and flogged and insulted...(Orwell 2016: 246) 中,被动化隐去了 store、destroy、erase、forget、kick、flog、insult 等动作的真正施事者。极权统治者作为以上动作的真正施事者被隐去,这便创造了一种客观的效果,不但模糊和削弱了极权统治者应为以上行为承担责任这一事实,还使其罪行合法化、模糊化。

(三) 情态: 权力地位的不平等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情态是人际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做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胡壮麟等 2017: 146)。情态所表达的意义可以通过情态动词来实现。由于人际意义是在人们的互动与交际过程中实现的(王振华 2016: 36),小说第一、第三部分中统治阶层代表奥伯良和被统治阶层代表温斯顿的对话极具代表意义。他们对话中的情态动词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奥伯良与温斯顿所用情态动词分布

情态动词	奥伯良	温斯顿	数量	百分比
may	2	0	2	1.16%
can	19	7	26	15.03%
shall	15	1	16	9.25%
will	73	10	83	47.97%
must	10	0	10	5.78%
might	1	0	1	0.58%
could	12	4	16	9.25%
should	5	0	5	2.89%
would	10	4	14	8.09%
总数	147	26	173	100%

上表显示,在两者的对话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情态动词有 will、can、shall、could、would、must。在所有的情态动词中,当权者奥伯良所使用的情态动词占很大部分,而温斯顿却只用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两者在情态动词使用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对 will、shall、can、must 等表示意愿、推断、能力、命令等具有高情态值的词的使用上。结合小说的具体语境,相对而言,统治阶层可以使用情态动词表达自己的观点、思想、推论、决定、命令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充分说明,统治阶层在极权社会中拥有绝对的话语选择权和话语优势,在政治统治中占有主动、权威的地位。相反,被统治

阶层对情态动词的使用频次很低,且只用来表达其对自身命运的预测和对统治阶级极端统治的不满,这体现了被统治阶层因话语权的缺失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这一处境。两者会话中情态动词使用情况的不均衡分布体现了极权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距离,也极好地诠释了两个阶层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平等状态。

(四) 主位结构: 意识形态的强制输入

主位结构是语篇功能的重要实现形式,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可分为无标记主位和有标记主位两种。当充当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时充当小句的主语时,这样的主位被称为无标记主位;如果主位不是小句的主语,这样的主位被称为有标记主位(胡壮麟等 2017: 166-167)。小说中,两种主位结构均突出了极权主义者的信仰与观点,是统治者向普通民众强制输入极权思想的重要方式。

无标记主位是小句的主语,便于语言使用者辨认,其使用可以在普通民众的认知过程中营造先入为主的效果,使他们无意识地接受极权统治者的思想观点。例如,在...the proles were natural inferiors who must be kept in subjection, like animals, by the application of a few simple rules (Orwell 2016: 63) 和 Proles and animals are free (Orwell 2016: 64) 这两句话中,the proles 与 Proles and animals 既是小句的主位成分,又是小句的主语。根据小说语境,proles 是指一群没有个人思想或政治观点的人,和动物一样受统治者任意摆布,不会对极权统治造成威胁。在极权主义者看来,这一群体生来地位低下,和动物一样极易被征服,只有这样的人群才能免遭惩罚。当普通民众看到这些话时,在其认知中便会意识到自身社会地位的卑微,意识到自己应该绝对服从极权者的意志和思想,只有这样才会获得自由。

有标记主位可以创造主题化效果。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Li & Thompson 1976: 460),其主语通常位于句首,也被称为句子的主题。如果句子的非主语成分位于句首,句子的重心发生转移,这就出现了主题化现象,达到了突出、强调的效果。小说中的有标记主位通过创造主题化效果凸显极权者的思想观点,从而给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 Reality exists in the human mind...

Not in the individual mind, which can make mistakes...*only in the mind of the Party*, which is collective and immortal(Orwell 2016: 224) 中, *Not in the individual mind* 和 *only in the mind of the Party* 是有标记主位, 虽放在小句的开头, 但又不是小句的主语。极权主义者用这两个有标记主位来阐释事实存在于党永恒的集体观念中, 而不是个人头脑中这一观点, 这有利于民众在认知过程中深化对此观点的印象。由此看来, 主位结构有效地使被统治者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统治者的极权观念。

四、结语

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分别存在着辩证关系, 权力与意识形态依附于语言, 并通过语言选择和应用得以体现和重构。在“三维模

型”理论框架指导下, 通过对小说《一九八四》从描写、阐释和解释三个维度展开批评话语分析可见, 及物过程刻画了极权社会残暴的专断统治和权力的滥用, 转换使得极权社会的血腥统治模糊化与合法化, 情态反映出极权者与民众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和“统治/被统治”的阶级地位差异, 主位结构是极权者向民众强制输入极权思想的有效手段。奥威尔借此批判了极权政治的危害, 传达了其对极权统治的不满和反极权思想。在小说中, 语言不仅是作者向读者传递信息的渠道, 还是反映和重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协助当权者行使权力和传递思想。同时, 语言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也会变成其使用者言行的桎梏。

参考文献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London: Polity Press.
- Fowler, R., B. Hodge, G. Kress, et al.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
- Halliday, M. A. K.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i, C. N. & S.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C] // C. N. Li.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57-489.
- Orwell, G. 2016. *Nineteen Eighty-Four* [M]. Nanjing: Yilin Press.
- 胡壮麟. 2013. 语言学教程(第四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1991.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等. 2017.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第三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振华. 2016. 新编系统功能语言学教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辛 斌. 2005. 批评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辛 斌, 高小丽. 2013. 批评话语分析: 目标、方法与动态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1-5.

(责任编辑 王照岩)

收稿日期: 2018-06-05

通信地址: 130022 吉林省长春市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Language: Dependency of power and ideology: A case study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Nineteen Eighty-Four*(p.48)

SU Long & XU Zhaohu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hangchun 130022 ,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n George Orwell' s *Nineteen Eighty-Four*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itivity , transformation , modality and thematic structure by adopting Fairclough' 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Halliday' s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as the analytical tool ,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language of this novel reflects the distinctive totalitarian view and anti-totalitarian ideology. This study shows that language is not only a channel for the writer to convey information , but also a powerful tool for refle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y , assisting those in power to exercise power and convey ideas. Meanwhile , language will become its users' constraint once it is affected by power and ideology.

Individual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 Endo Shusaku' s *Deep River*(p.54)

LAN Liliang & ZHAO C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Henan University , Kaifeng 475001 , China)

Deep River by Endo Shusaku ,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st-war Japanese writers , depicts the protagonist' s journey of pilgrimage to explore spiritual salvation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Using identity theor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spiritual growth ,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oul salvation. The novel interlaces the spiritual trauma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with their experiences in India , show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understanding of ego and belief , thus highlighting the theme of religious pluralism. The polyphonic structure of *Deep River* perfectly coincides with the theme of religious pluralism , which reflects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n personal beliefs in the post-war trend of democratic and cultural thought.

From literary “newing citizens” to political “newing individuals”—Value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nslations of *New Youth*(p.59)

ZHANG Dao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Guangzhou 510006 , China)

The period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on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by means of translation. As one of the prominent magazines , *New Youth* experienced very rapid and covert value transformation , which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quantity of its translations , but also in the microscopic levels of the translations , such as its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value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s of “people” and “individual”.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s , exploring how this covert transformation happened from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